

小 引

满头白发似少年，
药不离口心里甜。
泰山压顶步履健，
向阳葵花色泽鲜。
太行山麓湘楠木，
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
一部春秋乐晚年。

这首诗是陈明在 1976 年金秋季节书赠丁玲的。它以欢快的调子，形象地概括了丁玲在崎岖的世途上坎坷曲折的一生。你看，她这株生长在南国的“楠木”，几经曲折到了北国，经历了严寒的岁月之后，又被人强迫移到“太行山麓”了。但是，“楠木”的本性难移。不论在任何艰险的环境和恶劣的气候下，她都终年常绿，经岁不凋，端伟而芬芳。因为她心里充满了阳光。她虽然过去已经历了人间的“数不尽的风浪险”，眼下还处在“泰山压顶”的窘境中，但她仍笔耕不辍，赶写《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姐妹篇——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自得其乐 所以说是“一部春秋乐晚年”。1989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丁玲学术讨论会期间,陈明曾对我说:他写这首诗的时候 极“左”迷雾仍笼罩着全国,丁玲处境还不好,如果明写丁玲依旧在埋头写她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会惹祸招罪的 所以才说“一部春秋”。因为“一部春秋乐晚年”,也可理解为丁玲晚年阅读《毛泽东选集》其乐无穷嘛。①

丁玲生在清王朝末年,长在民国初年,伟大的“五四”狂潮卷起她生命的风帆,几经沉浮,才从黑夜挣扎到黎明。可是又有谁能想到,黎明后的风风雨雨又差点摧折她那生命之舟呢? 从她1904年降生人间到1986年离开尘世,八十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反反复复净化这个世界、洗涤我们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的灵魂。当我们纵观丁玲的生平事迹、研读她的全部作品后,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她的生命之舟叠遭风暴;她的坦诚,坚贞,顽强的性格却至死不悟;而她笔下的人物从莎菲到杜晚香,又形象地画出她生活、思想和艺术的发展轨迹。

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地创作和发表作品,才能真正的永葆其艺术青春,也才能真正感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相反,一个作家如果失落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他(或她)将会产生一种难能忍耐的寂寞和痛苦,因为他们步入文坛的时候都伴随着艰辛的汗水和幸福的泪花。丁玲的一生对人生的感受颇多,尤其是她作为一个作家,更痛切地感受到失去创作和发表作品的痛苦。丁玲的一生,几乎就是近一个世纪生活的缩影。她没有童年的欢乐,少女的幻想。在风雨如磐的时代,她

① 1989年5月在西安举行第四届丁玲学术讨论会期间,陈明在西安政治学院招待所“东306”房间向笔者介绍丁玲情况时,谈到他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降生在湖南省临澧县的乡下。她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跨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她生长在多事之秋的历史年代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刀光剑影，血火考验，使她在人生道路上较早地觉醒了，而且迅速地成长为一位著名的革命作家；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政治运动，又把她卷进了矛盾斗争的政治旋涡，随着政治波涛起伏而升降。但是，历史的航船还是载着多难的中国人民，当然也载着我们多难的女作家丁玲，遵循它的铁则前进。

童年的丁玲，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看够了人间的白眼，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一种冷寞的关系。步入少女时代她四出寻找出路，浪迹天涯，四处碰壁。可是哪里才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所呢？大革命失败，她更加痛苦，和当时许多年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苦闷、彷徨、愤懑。就在这年她开始了小说创作，塑造出一批独特的“莎菲型”的知识女性，实现了她的用笔控诉那个罪恶社会的愿望。从此，她就走上了漫长的六十年的笔耕生涯。随着历史的发展，她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日益深化，她的创作视野也迅速扩大，她笔下的莎菲女士们都已从“黑暗中”走向了光明。生活向我们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展现出一条前进之路，正当她沉湎于描写“革命加恋爱”的矛盾，表现革命神圣的时候，一只罪恶的魔掌夺走了她的伴侣和战友——胡也频。在那茫茫的黑夜里，任她奔波、呼救，打向她的依旧是凄风苦雨！悲伤、流泪有什么用呢？所以她排遣了悲伤，揩干了眼泪，振作了精神。“积极左倾”^①，面对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她的笔触伸向工农生

茅盾：《女作家丁玲》载 1933年7月15日《文艺月报》第2号。

活的领域，反映工农群众的呼声，表现工农群众的力量。正因为这样，1933年她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幽禁于南京。在魑魅的地狱中，她更看清了魔鬼的真面目，因而也越发使她思念共产党，向往解放区。她终于与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于1936年历尽艰险，逃离南京，奔赴陕北。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她亲历了血肉横飞的战场，经受了刀光剑影的严峻考验，迅速从一位“文小姐”成长为“武将军”。她以她那支“纤笔”，描写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反映我们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她参加华北土改以后，创作了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奉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丁玲全心全意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可是，不料从1953年开始她就无辜遭到批判，硬是说她和陈企霞是反动小集团的头目。从此，我国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丁玲厄运也就不断加深，以致落进命运的谷底。直到1976年秋天，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结束了“空前的浩劫”，丁玲才得以重返文坛。可惜，她这时已是72岁的老人了！她的文学创作的黄金岁月已白白流逝了！

这年秋天，劫后余生的丁玲及其丈夫陈明还被“流放”在太行山脚下一个闭塞的山村。这一对患难夫妻，终于见到了勤劳的人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金色季节，勇敢的人民以艰苦的斗争赢得了人间的“春色”。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庆丰收、祝胜利的欢腾中，文坛上这对患难夫妻九死一生，苦尽甘来，当然更是喜不自胜了！喜庆之余，陈明欣然命笔，赋得我们在前面所引的那首七律，书赠丁玲。在人生旅途风暴中跋涉了七十二个年头的丁玲，此时此地，既像一只饱经风霜剥蚀的小船，又像一株久经风雨的小树，迎来了明媚的春光。她怎么能不“一部春秋乐晚年”呢！

丁玲复出文坛后，感慨万端，常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 65 岁就好了！”又说：“年纪大了，当然要抓紧时间写”。她垂老之年逢盛世，过上了宽慰的日子。正当她以极大的热情为新时期文学的建设和繁荣四处奔波，勤奋笔耕的时候，不料病魔却于 1986 年夺走了她的生命！

丁玲的生命终结了，但她的精神犹存。她留下的近 3 百万字的文学著作，将永远是我们的珍贵的精神财富。丁玲的一生，是和我们的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回顾，总结丁玲坎坷的一生和她的小说创作，我想对当今文艺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反映改革，讴歌改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章 “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一创作前的生活和思想

—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女作家一个又一个出现在文坛上。冰心、庐隐、陈衡哲、白薇、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就像红线串着明珠一样，灿烂夺目。“五四”新文学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冰心由于写“小诗”、“问题小说”和散文而闻名于中外；到了大革命时期，这位闺秀作家逐渐沉默了，其他一些女作家也由于种种原因先后从文坛上消失了。可是就在冰心等众多女作家逐渐走向沉默的时候，又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丁玲在文坛崛起了。1928年春，丁玲以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赢得了青年读者而蜚名于文坛。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一种感伤的调子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当时年仅 22 岁的丁玲，是新婚不久的少妇，怎么在她的女主人公莎菲女士身上注进了那么多的精神苦痛呢？丁玲自己的身世和家庭是怎样的呢？

丁玲的人生道路是坎坷崎岖的，她是穿过荆棘、履着暗礁险滩走过来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丁玲这样命途多舛的女作家还是罕见的。

丁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蒋姓官僚地主家庭。她那时不叫丁玲，叫蒋冰之。她出生的这个世代为官的豪门望族，家产很大，银钱很多，到了 30 年代，还有 2 百多间的门院，连远近亲戚在内，还有 3 千左右人口，而且彼此都还十二分亲近。丁玲的祖父，曾作过很大的官职。丁玲的父亲蒋浴岚，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世家子弟，有些贵公子和名士气，聪明、慷慨、洒脱、有才华。他十几岁就中秀才，留学日本，学习法律。他不仅头脑不俗，人品也好。特别是他具有一种艺术才能的天赋，喜欢美丽的东西、热闹的事情，自己也在陶器上雕刻。他还由于自己经常生病，又学习了《本草纲目》等医书，成了医生，开了药铺，行医散药，造福乡里。这个封建大家庭还经常好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据说蒋浴岚有一次叫一个工人整天作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又不会骑马，等绣好马鞍后，他请别人来骑马，他自己却跟在马后面小跑。以后，他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器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吸毒的人渐多，蒋浴岚也染上吸毒的恶习，挥金如土，身体多病，意志消沉，一无作为，甚至堕落成一个“败家子”。1908 年，他刚 30 岁出头，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留给妻子的“遗产”，除了无限的悲苦和还不清的债务以外，还有一个 4 岁的女孩（即丁玲）和一个“遗腹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妇女呻吟在社会的最底层，孤儿寡母更是挣扎在世态炎凉的无底深渊。往后，这个蒋氏封建世家，就逐步走上败落了，虽然还有那么多人，但是差不多无一人读书，都在酒色中完结了。

蒋浴岚是名副其实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大少爷。他的侠气和浪漫性格，对童年时代的丁玲影响不小。

丁玲的母亲姓余，闺名曼贞。因为她受到新文化的影响，向往妇女解放，甚至羡慕唐朝武则天时代女人可以考官做事，

所以曾立下胜过须眉之志，因而蒋浴岚去世后，她改名蒋胜眉，字慕唐。蒋慕唐原为湖南省常德县一个书香人家的闺秀，从小就有机会在家中读书，随着哥哥弟弟们学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藩篱进行突破，慢慢滋生了民主革命思想。所以，在丈夫死后，蒋慕唐决心摆脱孤儿寡妇的悲惨境况，走自立道路。1909年，丁玲5岁的时候，慕唐说通族伯兄弟，卖掉家产，带上弱女幼子，回故里常德娘家寄住。她决心走一条平等自立的道路。离别蒋家的时候，这位年轻寡妇不禁涌起生离死别的凄楚情。直到1941年，蒋慕唐还这样描述当时离开家园的凄凉情景：“我清检正屋锁闭，托人照看，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常德）。”^①幼小的丁玲就这样随着悲哀的寡母离开了那个封建大家庭，并且从此以后，就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可见，丁玲虽然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封建大家庭，但不仅没有过上奢侈豪华的生活，而且幼小的时候就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苦味，纯洁的小心灵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懂得了人间的哀愁。她稍长以后，进一步体察到人生世途的险恶，在那茫茫的生活海洋里，她犹如萍飘蓬转，漂泊的生涯使她尝尽了人间的辛酸。

蒋慕唐是一个富有刚毅性格的女性。她一面承担抚育子女的重任，一面刻苦求学。

1910年，蒋慕唐30岁，刚刚脱下孝服，就报考了湖南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这是常德第一所女子学堂速成师范学校。入学后，她不但放开骨折畸变的小脚，而且忍着剧痛和歧

丁玲：《我母亲的生平》收入丁玲长篇小说《母亲》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视在广场上跑步出操。值得提出的，是蒋慕唐在常德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还与后来成为女革命家的向警予同学，并结为忘年交。6岁的丁玲这时也随母亲进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幼稚班。蒋慕唐就在这时候，将女儿名字“蒋冰之”改为“蒋玮”。丁玲现在还带着深情回忆当年这段生活：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30岁的母亲在师范班，6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全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了风的宝蓝色的瀛羊皮袄和黑色的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那里见过，一个名门的青年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①

蒋慕唐除自己刻苦攻读外，还十分重视教育女儿丁玲。幼小的丁玲害过几场病，每当她不能到室外玩耍的时候，就躲在母亲身边，听母亲娓娓不倦地讲故事，什么水帘洞、托塔天王……这些迷人的故事，在丁玲的小小脑海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丁玲逐渐长大了，母亲又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等古诗文。丁玲自己有了识字看书能力以后，她就不再睁大圆眼听母亲讲故事了，而是独自一个人悄悄地躲在舅舅家的后花园，慢慢地去读那些动人的故事。所以，丁玲很小的时候就能背诵一些诗文了。在求知上，幼小的丁玲得到了很好的满足。可是，在家规森严的舅舅家，来自舅父舅母的白眼和冷遇，使她只得经常与奶妈、丫头和长工们在一起。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境况，给童年的丁玲蒙上一种

^① 丁玲：《向警予同志给我的影响》载《收获》1980年第1期。

伤感的情绪。然而这种生活境遇，也使丁玲从小就养成了自尊、自重的性格。母亲的生活苦况及其对生活的勇敢，深刻地教育着丁玲；蒋慕唐与向警予结为至交，平常相互频繁来往，对童年丁玲的思想也有好的影响。

1912年，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停办了，蒋慕唐买舟东下长沙。因此，丁玲也随母亲到了长沙，并入小学一年级读书。蒋慕唐到长沙以后等了很久，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才迟迟开学。她考进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将丁玲及其弟弟寄养在姨妈家。本来，他们娘仨相依为命，现在过着一种难耐的分居生活。由于经济窘迫，蒋慕唐在这所学校只念了一年，于1913年春天，就到桃源县去当小学教师了。母亲为了谋生离开了长沙，丁玲独自一人留在长沙读书，是学校最小的寄宿生。她只有寒暑假才能与家人团聚；平时只有向警予经常去看她，温暖她那颗寂寞的童心。后来，丁玲也随母亲去桃源，转入桃源县立小学读书。在课余时间，母亲依旧给丁玲讲故事，但是讲的内容不再是水帘洞、托塔天王之类了，而是西方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的故事，如罗兰夫人等。民主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2年后，蒋慕唐于1915年又回到常德，担任常德东门外女子小学的管理员（即舍监，管理学生思想教育的）。丁玲又随母回到常德，住在城里舅父家，就读于附近的女子学校。丁玲这时，不只是偎在母亲身边读诗文，听故事了，还在课余时间翻读了中国的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和《聊斋》等。她阅读这些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似懂非懂，但却被这些故事情节深深所吸引。另外，丁玲这时还接触了林琴南翻译的一些外国小说以及《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等文学书刊。她极爱《块肉余生记》、《十字军英雄传略》和《水浒传》、《七侠五义》等中外名

著。向警予每到寒暑假一有空就到常德看望他们娘仨，并且又一定会给丁玲带来外界的许多新鲜新闻和消息。所有这些，都开阔了丁玲的视野，迅速打开了她思想的天窗，培养了她的文学兴趣。

1918年的春天，丁玲的多病的小弟弟突发急性肺炎夭折，母亲蒋慕唐痛不欲生。14岁的丁玲，每见母亲悲伤哭泣，就一头倒向母亲的怀里，哭喊着“妈妈！妈妈！”母亲正是挂念她这无依无靠可怜的女儿，才勉强支撑精神活下来的。从此，只有她娘俩相依为命，忍受着无情岁月的煎熬。蒋慕唐身边虽只有女儿丁玲一人，但为了女儿的前程，就在这年暑假，她送丁玲去桃源县报考省立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丁玲自幼聪颖，她不仅以第一名成绩考取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入学后还经常以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从这时候起，她不仅爱好文学，还喜爱绘画、唱歌和体育，算术成绩数最佳。

二

丁玲幼年丧父，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少年时代又失去了唯一的弟弟，亲人生离死别的苦味，她都感受到了。这些家庭的变故，在丁玲幼小的心灵上，过早地蒙上一层层阴影，留下一道道伤痕。又因为母亲的启蒙教育，环境的影响，她自幼就爱上了文学。

但是，丁玲成长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女作家，主要还应归功于伟大时代的哺育。

丁玲所生长的时代，是腐败黑暗的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那时，一方面反动封建统治集团作垂死挣扎，一方面中国大地上民主革命又风起云涌。这样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着丁

玲。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的枪声，在丁玲的幼小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她那时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但是她有机会与她母亲一道为在起义中牺牲的亲友举哀，随着庆祝起义的游行队伍欢呼跳跃，她在人们的情绪感染中，领略到了痛苦和欢乐，萌发了新的希望。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丁玲后来回忆说：

使我最早领略到痛苦和欢乐的感情，是辛亥革命，我们县里考棚的枪声……我的一个姨父的兄弟牺牲在那里。烈士的鲜血，有如苦汁，浸透了我周围亲属们的心胸。我的小小的心灵，也跟着受了伤，我第一次尝到了痛苦。但当革命成功，十月十日的那个夜晚，我站在大人物的后面，看着满街欢乐的，狂飙似的火把的人流，繁星似的花灯，我随着游行队伍奔腾跳跃，大声喊叫，第一次压不住要炸开来的心跳。^①

丁玲就是这样背负着时代的痛苦和重压，憧憬着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艰难地成长着……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了，结果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换了一块招牌——清朝换成民国，人民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在茫茫黑夜中进行着苦苦地探索，寻找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道路。他们找到了西方，再找到了东方，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当‘五四’运动的潮流从古老的北京波涌到湖南的时候，作出迅速、深刻反映的，就是丁玲正在就读的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作家沈从文在

《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湘西·常德的船》一文中曾有这样记叙：

常德县沿沅水上行九十里，即到千五百年前武陵渔人迷路问津的桃源。……那里河上游一点，有个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影响到湖南时，谈男女解放、自由平等、剪发恋爱，最先提出要求并实现它的，就是这个学校一群女学生。

这“一群女学生”中就包括有丁玲。十五、六岁的丁玲，深受“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成为当时的积极活动分子、出风头的人物。她在高年级大同学王剑虹（淑璠）、王一知（杨代诚）的带动下，积极热情地投入了“五四”革命运动。她和当时所有的激进青年一样，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为了表示与封建传统决裂，她不顾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毅然剪掉了辫子，热心于游行示威，积极于演讲辩论，为如何免亡国奴、如何求妇女解放等大课题慷慨陈词。王剑虹和王一知主办桃源省立二师附属的“平民夜校”，丁玲热情地担任了这个平民夜校的小先生（崽崽先生）教珠算。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时期的进步书刊，尤其是喜欢阅读《新青年》和《新潮》。她对新诗和其他新文学作品，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从这些新的书刊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更想从中寻找到个人出路和国家强盛的道路。

“五四”运动革命浪潮，把丁玲冲向了广阔的天地。她突破了原来生活的小天地，看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意识到山外还有青山，楼外还有高楼，于是她不满于桃源地处偏狭、知识落后的境况。就在1919年暑假以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她由桃源转赴省会长沙，进了当时有较多新风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这所学校里有些比较进步的教师，他们常常给学生介绍一些新书新报，讲解新文学，灌输新思想。丁玲所在班级

的任课老师中，有位名叫陈启明的先生，还是新民学会会员。陈先生所讲的那些反封建的言论，鼓动了丁玲那颗少女的心。陈启明先生以后又发现丁玲具有写作才能，于是就鼓励她多读多写。在周南女中，由于有陈启明先生的指导，丁玲有机会读了很多的中国新文学作品和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她不仅如饥似渴地读着冰心、周作人、胡适、俞平伯、康白情、陈独秀等人的作品，她还特别喜欢 19 世纪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富有很强爱国主义思想的小说，有力地打动了她年轻的心。这些作品都进一步培养了她的革命思想和文学兴趣，扩大了她的视野。她努力练习写作，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本日记；还学习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丁玲说：“这些东西当然是很幼稚的，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支笔来写出我的不平，我对中国社会的反抗，用笔来呼喊，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①

当时，丁玲贪婪地读着‘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她喜欢阅读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以便从中吸取新的思想观点。郭沫若的《女神》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她尤其爱不释手。丁玲在周南女中的一段学生生活，对她以后走上革命作家的道路，是个良好的开端。她至今还深深地怀念这段学生生活：

他（陈启明——引者注）常常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都应该翻个格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那些“造

丁玲：《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跨到新的时代来》1951年版。

反有理”的言论。施存统先生的“非孝论”的观点对我印象很深。^①

所以，当新的思想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着封建专制的腐朽大家庭的时候，丁玲胸中燃起了新思想的火炬，对她自己出身的那个封建大家庭，深感厌恶，觉得它里面充满着虚伪、无耻、专横、跋扈、腐朽、堕落、势利。如果丁玲在周南女中继续学习、生活下去，她的思想觉悟和文学水平都将会得到迅速提高。可是“五四”运动后周南女中出现了复旧逆流，校方把进步教师陈启明等人解聘了；丁玲也因此愤然离校。1921年暑假，丁玲与杨开慧、徐文萱等七同学参加补习班学习一个多月，随后一起转入男女同校的长沙岳云中学，成为岳云中学最早的女生之一。

“五四”运动震醒了沉睡的中国，解放了许许多多被禁锢在封建礼教樊笼里的青年，更把许许多多有为的青年卷进了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中。丁玲就是这千千万万个青年中的一个，她毅然决然地冲出了她那个封建大家庭、展翅高飞，飞向广阔的社会，飞向新生活的海洋，去开辟人生大道，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丁玲到老，也感激“五四”运动对她的教育：

“五四”来临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的奋斗精神哺育着我。在我正是青少年的时候，我放弃游乐，不管懂不懂，懂得多少，我如饥似渴地寻求当时的书籍报章，要从那里找到真理，找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找到一个人做人，做一个有用之人的道路。……我曾展翅高飞，高歌迎来旭日似的希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望……①

三

1921年寒假，丁玲准备同王剑虹等同学去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却遭到她舅父的反对。她舅父要她在湖南读书，毕业后与他儿子结婚。为此，丁玲与其舅父发生激烈的冲突。由于陈启明先生的教育培养和王剑虹的帮助支持，丁玲这时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看清她舅舅代表的是旧家长的势力、旧社会反动阶级的势力，她不但向他妥协，并决心与之斗争到底。她撰写文章，揭露他虐待佣人、借办育婴堂等慈善事业剥削穷人的恶劣行径；并将此文送交当时的长沙《民国日报》发表（发表时隐其真名，作者以“□□□”代替，其舅父代以“×××”）。丁玲说，这是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22年春节后，18岁的丁玲在她母亲的支持下解除了由外祖母包办的与舅父家大表兄的婚约；再加上她在报纸上撰文揭露其舅舅的劣绅行径，于是遭到其舅父的严词恫吓。在强力面前，丁玲并没有屈服，决计冲破封建罗网，飞向广阔的自由新天地。她得到挚友王剑虹的鼓励和支持。王剑虹认识在上海的王会悟，王会悟告诉王剑虹：上海有一所平民女校，要她们去上平民女校。为了追求真理，当时只差半年中学就毕业的丁玲，随着大同学王剑虹、王一知离开湖南，奔赴上海。当时丁玲认为：“年轻人应该走遍天下”。②

《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

② 包子衍等：《丁玲谈早年二三事》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从此，丁玲离开了偏狭的湘西，告别了熟悉的常德。沈从文在《湘西·常德的船》一文中这样记载着：“常德县城本身也类乎一只早船，女作家丁玲，法律家戴修瓚，国学家余嘉锡，是这只船上长大的。”丁玲当年在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最早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也正如沈从文所说，“五四”运动的新书刊确实煽起了她的“青春的狂热”现在她带上“满脑子进步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幻想”，跑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来了。

丁玲到了上海，将接受怎样的命运呢？她和她的女友们，进入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读书，一心要去找真理之火。丁玲在平民女校曾一度把名字“蒋冰之”改为“冰之”，以废姓蔑视传统意识。但是，不料她废姓却引起很多麻烦，于是她就从字典中找个笔画最少的字——丁作为自己的姓。从此她的名字便变成了“丁冰之”。共产党人当时办的这所平民女校，是半工半读性质的新型学校，表面上是一所学校，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的地点。茅盾说：“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国各处古老的家里爆发，一些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的大都市内寻求她们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校的学生大部分就是这样反叛的青年女性。”^①丁玲当时在上海平民女校还参加了一些革命纪念活动，为工人罢工捐款，到工厂去演讲。特别是参加了1922年马克思生日纪念活动，听取了李汉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开始，丁玲对这些事都很有兴趣，认为都是革命。可是，半年以后，她的政治热情就下降了。她虽然与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曾有过交往，可是终

^① 茅盾：《女作家丁玲》载1933年7月15日《文艺月报》第2号